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黃 駿

【摘 要】

本文以Collins的文憑社會論述，作為探討教育及相關的社會資源是否不均分配之理論。Collins主張從事「政治的勞動」的支配階級將以「文化市場」作為穩定其「職位財產」之關鍵。以前透過教會，如今則透過學校，讓某些人擁有與菁英們類同的「生活風格」、談吐與禮儀。教育於是成為「文化通貨」，亦即用以獲致菁英職位的共通交換媒介。但教育也會發生種種通貨膨脹現象。Collins的上述理論與韋伯的身分群體之概念頗有牽連，雖包括Collins在內有不少學者也都提到他受韋伯影響，但亦有人認為他受馬克思影響。經本文探討，發現他確是一小幅修正後的韋伯主義者，且他是以韋伯論述為主軸而吸納馬克思、涂爾幹等理論傳統。但本文亦指出，依Collins的詮釋與分類，韋伯其實也可算是延續著馬克思主義傳統，其身分群體只是補充、修正馬克思階級觀。由以上討論，本文推論出Collins可算是以一修正後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提出文憑社會論。這論述對理解台灣的教育及相關的社會資源之不均分配，有一定之助益。

關鍵字：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文化資本

壹、問題意識在臺灣經驗中之源起

台灣自解除戒嚴後，社會運動的規模與頻率似已逐漸縮減，近幾年來較重大的社會運動大概首推1994年4月爆發的「四一〇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之後並陸續有相應的運動出現。參與者抨擊台灣教育病症中的管理主義、升學主義和粗廉主義，推動「四一〇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之臨時組織——「四一〇教育改造工作隊」——針對這三大病症給予的處方係所謂四大訴求：一、落實小班小校，二、廣設高中大學，三、推動教育現代化，四、制定教育基本法（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1996：432-434）。該年4月16日，經四十多個團體代表及一些個人決議成立「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該聯盟提出的「民間教育改造運動的基本原則」即以「社會正義」為教育改造之基點（註1）。

吾人對四大訴求中第二項——廣設高中大學——特別感興趣，其乃針對升學主義而發（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1996：433），但卻引生了不同意見的討論。反對者有兩種不同論點。第一種反對意見認為，開放大學門戶不能解決升學壓力，蓋升學主義的源頭在「文憑主義」，因為人們都希望藉由擠向熱門科系，以便畢業後可獲得高薪工作，故光提高大學入學率不足以解決問題，應轉置焦點於提高技職教育的品質，健全專業證照制度以增進職業尊嚴（轉引自黃武雄，1997：63）。第二種反對意見認為，升學主義的源頭雖是「文憑主義」，但所牽涉的是「勞心」／「勞力」的階級偏見，使人們不願從事第一線的生產工作，最終出現一大批好逸惡勞、百無一用的閒民（黃武雄，1997：63，69）。黃武雄指出，第一種反對來自左翼論述，第二種則源於右翼，蓋後者的背景乃菁英主義，菁英有權力規劃社會分工（黃武雄，1997：69）。本文在此提出不同的看法。第一種反對意見之實踐不必然受左翼論述支持，被黃武雄認為源於右翼的第二種反對意見實親和於左翼。先就第二種反對意見言之，本文認為，若說是菁英主義，則只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菁英主義，蓋菁英不過想誘騙某些人放棄「勞心」／「勞力」之分殊，致回到基層勞工崗位，菁英則藉由規劃社會分工而仍將本身佇留在「勞心」／「勞力」之分殊中的「勞心」一方，並未擺脫「勞心」／「勞力」的階級偏見；若第二種反對意見當真批駁「勞心」／「勞力」的階級偏見，則將推論出大家都應勞力或都應既勞心且勞力，於是乎每個人都有機會從事第一線的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生產工作，故此論述確貼近於左翼。至於第一種反對意見，依其論述邏輯，可推出高中、大學之廣設將會造成某種受貶值的「後段」冷門科系，人們看在眼裡的仍是那些少數的通往高薪的熱門科系，故高中、大學之廣設乃形同虛設，對治之道在健全化技職之證照制度以取代文憑主義；但技職之證照不也是另一種文憑麼？姑不論技職之證照若廣為發放之下，是否也將造成各種高低面額不等的分殊，技職之證照與大學畢業證書這二種文憑之間勢必發生評比之關係，屆時若前者凌駕後者，在大學未被取消而仍存在下，大學畢業證書可能轉而成為取得技職證照的某先決條件；倘若後者仍凌駕前者，則不管技職之證照是否可能轉換為取得大學畢業證書的某種先期條件，均不致動搖了原本的升學主義。故而只要仍存在大學發放文憑之情況，某種崇尚職業勞動之左翼目標便不易實現。

但本文認為上述這兩種反對意見其實觀點仍有一致的地方。兩造皆直指教育的問題在文憑主義。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還表示不只應以社會正義去批判教育資源之配置，更須注意「價值觀的分配」，即「象徵資源」的分配正義問題（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1996：30）。在各家學者中批判文憑制度能兼由注意文憑貶值狀況及勞心／勞力之分隔，又能著重以「象徵資源」角度理解教育，Randall Collins無疑是一位重要代表人物。Smelser在其《社會學》書中論及教育的衝突觀點，他說：「學位也作為社會身分之象徵這件事，反映了教育之間接、象徵的面向」（Smelser, 1984: 249-250）。就在此處，他提到了Randall Collins的作品（Smelser, 1984：250）。其他在討論有關教育資源是否公平分配或受教育管道是否暢達時，Randall Collins也是文獻常提及的學者。紐約大學的C.H. Persell與P.W. Cookson在〈給予特許狀與以物易物：菁英教育和社會再製（reproduction）〉（1985: 114-129）一文中指出，經過對四十二個住宿學校的訪問與觀察，結果證實了Collins的主張——階層化乃通過對社會接觸之操控而可維繫。奧瑞岡大學的V. Burris表示（1983: 454-467），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無從解釋一種長期存在的「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其理論也與經濟復甦情況減緩時，工人仍尋求進一步教育的經驗相矛盾，相形之下，Collins主張「過度教育」係出於文憑在職業揀選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則較具解釋力。R.A. Wanner與L. S. Lewis認為（1982: 61, 2: 436-455），受到結構限制的自由市場是否對收入之配置施加影響，在這個爭辯中，Collins是站在肯定的一方，而且他是藉由社會衝突觀點而提出。M.S.H. Hickox（1982, 33, 4: 563-578）在評論馬克思主義之拒斥由「技術—功能」理論解釋教育擴充時，指出這種拒斥早已在Collins的論點

中作過最完整的表述。R. Murphy在〈教育社會學中的權力與自主〉(1982, 11: 165-178)中，認為Collins理論的價值在於指出，組織藉由職位附帶之教育條件排除了與菁英之身分文化不合者，職位附帶之教育條件實不與技能有所相干。

針對Collins談教育方面的代表作——《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之歷史社會學》，J.E. Katz (1983: 91-92)的評論是，Collins的主軸係「文化市場」乃階級掌控生產之關鍵，文化已變為一種通貨，而學校角色不在於技術培訓，而在傳遞某些言談的模式、禮儀、美學品味；但Katz指Collins對基層勞工有著太浪漫的偏向，工業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皆重視文憑作為分流機制，尤其愈是面臨公平之要求時，更倚重文憑制度。C.F. Armstrong的評論則為，Collins主張是文化——而非技術——決定了得否進入具權力的群體，此文化係由菁英學校中獲致，公立教育體系乃盎格魯一新教徒將其文化讓新移民予以內化的工具；但Armstrong也批評Collins對中等以上學校的發展史著墨太少而欠完整，且忽略了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文獻 (Armstrong, 1981, 59, 3: 861-863)。以下於是先就Collins在《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之歷史社會學》一書及其他作品中的論述，分析整理要旨，然後與韋伯的相關著作比對，之後作出本文之主張。

貳、交談市場(conversational market)、文化貨幣(cultural money)與族群對抗

Collins立論的基點之一，係將勞動分為兩種：生產的勞動與政治的勞動，前者雖指向財富的物質生產，但獲取財富並非自動發生，而受後者左右，蓋後者設定了組織結構與勞動市場的框架 (Collins, 1979: 50)。這個二分對立即涉及所謂「組織政治」，對於理解組織之形塑及組織中的階層化十分重要，蓋此二分將主要的兩個社會階級給標示出來：勞動階級與支配階級 (dominant class) (Collins, 1979: 50, 52)。這區分是一抽象概念上區分，因為在經驗上同一人可兩項都做，因之也可說人們的工作是在這兩造間各占若干比例而組成；即使是高度物質生產的部門也具有政治的成分，所以藍領工作者仍可能運用文化上和組織上的資源以造成有利的結果，不管是正式地透過工會，或非正式地透過工作場合的社會人脈。是故，人們對權威的認可並不會有著斷然判明的階級對立，而須視其處於何種較小的區域性的利益群體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Collins, 1979: 53)。因此可以這麼說，現代職業體系是由各種職業和其職位 (positions) 占有政治資源多寡的變異情形所形塑 (Collins, 1979: 53)。Collins的意思在於，組織政治在組織中的各種場合都是存在的，不僅支配階級可從事政治的勞動，勞動階級也一樣會透過政治的勞動而對其他勞動階級役使組織政治，只不過支配階級從事之政治的勞動更成為Collins認為值得探討的對象。

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此種組織政治的資源從何而來？其於時空中的分配又依循什麼基礎？Collins認為，任何形式的政治的主要武器在於兩種能耐：形塑聯盟的能耐，以及促使他人銘刻出既定現實定義的能耐 (Collins, 1979: 57)。

以上兩種能耐皆與文化之效果有關，尤其當文化以它自己的一種交換結構而分配下 (Collins, 1979: 57-58)。既言及交換結構，也就牽涉所謂市場之概念，於是，市場就不是只有一種，而可分成兩類：經濟財貨與服務的市場相對於「文化市場」，它們並不作為基礎與上層建築之別，卻是手段與目的之分 (Collins, 1979: 58)。這裡的「文化市場」便與前述人們易受所屬較小的區域性的利益群體影響，連上了關係。人們在其工作場合上的區域性的利益群體中，譬如說，必然有著各種交談，這正是不可忽略的文化形式。Collins在此引用了他自己在另一本著作《衝突社會學——邁向解釋的科學》中的研究以佐證。

Collins的確在《衝突社會學——邁向解釋的科學》一書中提出了各種類的交談，如現實性談話 (practical talk)，這種談話又包括工作的談話與本行的談話 (shop talk)，前者是藉談話以獲致談話以外的某些物質目標或資訊，後者雖也接近前者，但差別在它容易在酒吧間而非工作場發生，是故交誼性較重。另外還有意識型態的或即正當化 (legitimizing) 的談話及閒聊扯淡，這兩者都是儀式，前者是較嚴肅地對某群體認同或效忠的舉措，後者則是放鬆的、非正式的儀式交換，階級文化的界限常常就建立在誰被認識或不被認識，進入一階級的身分社群的障礙乃在其被排除於閒扯圈之外。此外還有知識的討論、娛樂性的談話、私房話等 (Collins, 1975: 114-131)。準此Collins乃提出存在著所謂「交談市場」 (conversational market)，當中流動的交談資源來自共享的現實關懷、娛樂活動的趣味、消費上類似的品味、政治、宗教與思想上的旨趣等 (Collins, 1975: 133-136)。以上形就了人與人之間各種關係，「交談市場」成為界定各種圈子的資源邊界 (boundary)。

Collins接著區別兩種不同的文化生產：土產文化與正式生產文化。前者

指日常生活互動之經驗，後者則經由特定的文化生產組織。土產文化傾向保守地再製其自身，正式生產文化則由更抽象的象徵或符號所構成，創造了更概括性的指涉參考系統，傾向將每個人予以象徵化或符號化，允許更大且更具自我意識的社群，於是可用以動員大眾職業群體與大規模社會運動（Collins, 1979: 60, 61）。經由特定的文化生產組織所製造的正式生產文化，在歷史上最早的這類組織之一是教會和其他宗教會社，它們擁有全職的專家致力於象徵的表達；另外一批特定文化的製造者即是學校（Collins, 1979: 60-61）。

土產文化所支持的是以物易物的地方市場，正式生產文化則像是貨幣通貨（monetary currency），後者是可以廣為磋商的，可作為一交換中介，也就可用為評估聲譽的廣泛基礎，亦即顯現為一價值的儲存庫。一個「真正」類似通貨的文化「貨幣」，僅在能夠進一步轉換之下，才使其存在成為可能。負責生產文化的組織愈是走向正式化，文化就愈像通貨。於是乎，當貨幣「供給」方面有了自外而至的添增時，文化所能購買的社會成員資格的「價格」可能走向通貨膨脹；相對地，其價格的萎縮也就可理解（Collins, 1979: 61-62）。Collins的意思是，現行的社會發展，已使得文化成為一般的貨幣，成為可評價聲譽的普遍性工具，並可藉由貨幣通貨之隱喻來認識社會結構。人們掌控生產文化的組織或擁有較多文化者，就好比擁有較多的貨幣，可用以交換或謂購買其他貨財。貨幣的性質在其乃一普遍性的交換媒介，其他貨財均可藉由它得到一個彼此交換的比例值；而如今文化已具含此一性質，而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連繫上面的說法，吾人可以這麼講，以前是由宗教所授予的神聖頭銜作為這種「文化貨幣」，現今則由各級學校頒給的文憑取代其成為新文化貨幣。亦即，人們在過去是藉由與教會的神職人員接近，懂得許多神的語言、神對人的認識與諸多行為上的要求，因之一群能夠共享這些事物的人，互相肯認、慰藉，在彼此皆感理所當然之下，占有了社會上較高的位置。如今則學校依樣畫葫蘆並取代了教會，具有類似高學歷的人，互相標榜、欣賞、讚譽對方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與作法，大夥圍成一圈坐地分享社會中大部分的利益。但因圈子外的人也想鑽進這個封閉圈子，於是也就會努力通過學校拿到文憑來換，大家都想換的結果，學校增加了，學位換職位的事也就不容易了。花費工夫得來的文憑，由於擁有者眾，換來的職位恐怕比先前提升不了多少，於是文憑貶值，等於發生了「文化通貨」膨脹。

Collins更進而表示，文化甚至比起一般人們在經濟財貨市場所使用的貨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幣，更根本且具影響力。怎麼說呢？

一般人們在經濟財貨市場所使用的貨幣，雖可用以購置財產，財產的多寡之分可以形塑不同階級，但Collins對財產提出不同的見解。他指出財產並不限於物質或金融方面的擁有物，「職位」如何形塑才是構成勞動市場中最直接的財產形式，這「職位財產」決定了人們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階級組織與階級鬥爭（Collins, 1979: 53, 54）。講到這裡，吾人於是發現為何Collins語出「一個『真正』類似通貨的文化『貨幣』……」云云，這「真正」一詞正是出於他的確認為文化「貨幣」比經濟財貨市場所使用的貨幣，更為關鍵，甚而前者已成為後者的基礎。於是結合先前所言，吾人可以這麼說，能夠有機會跟高層職位者的文化資源——如特定交談方式與內容——配合的人，就能因此也占有較高層職位而成為支配階級，從事的是政治的勞動；缺乏此機會者，跟這種交談方式與內容格格不入的人，便成為占有較低職位的勞動階級，從事的是生產的勞動，他們不能直接獲得物質生產的成果，得仰賴具有特定交談文化的人來分配。

以美國為例，學校製造了文化菁英的群體。通過明白的培訓，或通過揀選具菁英背景的學生，或兩者兼具，這些學校是私立的一些中等預備學校和菁英學府——如長春藤盟校和少數主要的州立大學；在職業培訓方面，製造文化菁英的學校則是附屬於那些菁英學院和大學的職業學校。另一方面，製造非菁英的、比較屬於社會化性質的中等學校，則是些公立的中學，尤其在中等階級的居住區。若由盎格魯—新教徒背景的僱主看來，天主教學校和全是黑人的學校是最不可接受的。在美國，最被盎格魯—新教徒背景的上層人士支配的組織，是大型公司和具有全國性組織的企業（Collins, 1979: 36）。在諸多的個案研究經驗中，可發現職業的獲取與教育之間有著比較重要的關聯。這關聯是經由文化建構方面之迂迴而達成。簡單地說，僱主的文化與學校的群體文化間的配搭，可視為一連續體（Collins, 1979: 35-36）。然而由這裡的論說可以發現，原來Collins所指的文化貨幣或文化市場，還涉及到不同族群間的矛盾問題，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多族群國家的背景下。

美國由於幅員廣闊、資源豐盛，相對地，人口較為稀少，在十九世紀創造了大量的勞動需求，於是許多人移民過去，這些人便對早期到達美國的盎格魯—新教徒背景的白人，形成了威脅。盎格魯—新教徒背景的白人對工作、娛樂、性行為抱有禁欲主義態度；而天主教移民多來自被貴族地主所統治的社會之底層，辛勤工作和儉省係來自外來的壓力，並非內化的理念，有著宿命主義態度。Collins並引述韋伯的研究，盎格魯—新教徒傾向共同管理社區

事務，天主教徒農民則遵從來自父權家族之政治順從的文化遺產，是故，雙方在文化及政治上很難融合乃至相處，發生了各種愈來愈多的衝突。而印地安人則又受到他們共同的排擠。至十九世紀晚期，除了愈益增多的移民這一因素之外，加上大城市、大型科層組織與大眾媒體的興起，將原本早期藉由封閉的盎格魯一新教文化以劃分職位的優勢給毀壞了（Collins, 1979: 95, 97-98）。那麼，盎格魯一新教徒因之屈服了嗎？按照Collins上述的理論，他們要搶回原本的支配階級的優勢，必須回歸文化的場域東山再起。這指的是什麼呢？

前曾言及，製造正式生產文化的文化生產組織，包括教會和學校，既然靠教會已無法竟其功，當然就靠學校了。也就在十九世紀末期，在爭取社會優勢地位的過程中，美國開始往建立文憑制度的方向邁進，等於是新教徒打算另闢競技場與其他移民較量，這一方式雖在建立過程曾遭農民與城市工人抵制，但逐漸受到不同族群人士的接受，文化上原本的衝突轉移為文憑與成績上的競逐，各類不同的學校也在各界採納此競爭結構的壓力下，逐漸整合為由小學至大學的一貫序列，美國終於成為工業化國家中，擁有最高大學畢業生比例者。這當然與大學數量多有關，但大學此一文化生產體系的擴張，若未伴隨某些職位的增加，將造成交換職位之文化通貨的膨脹。結果，某些時候，政府或企業組織的職位增加了，但這些職位並沒有相應的工作內容，於是，存在了諸多科層組織中的「閒差」（sinecure），以作為「凱因斯式失業」的解決方式；或者，文化通貨的膨脹發生了，人們擁有比父兄更多的文化貨幣，卻仍從事與父兄類似的職位，但許多人們欲得到更高的職位，於是，研究所文憑成為下一個爭相競逐的目標，以累積更具購買力的文化貨幣（Collins, 1979: 102-127; 1988: 178-182）。

Collins有關教育發展與族群對抗有關的談法，吾人可有下述說明。周珮儀（1999：540-543）曾指出右派教育論者認為文化差異即文化缺陷，建議以共同文化的國家課程，透過同化和公民化以補償「文化不利者」，並順帶防堵邊陲文化對統整文化的威脅；但左派論者以「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角度指責這個「順帶」恐怕才是重點，它掩蓋了族群和階級偏見；H. A. Giroux亦表示右派訴求「政治化教育」（politicizing education），左派訴求的則是「政治的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上述說法正可用以說明Collins對於教育含有的族群衝突背景的觀點。Collins有關「閒差」的說法，則與「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所言科層組織傾向於充斥冗員（Smelser, 1984），觀點近似，事實上，美國經濟、社會理論家韋伯倫

(Veblen, 1934) 早就提出，資本主義已發展出「有閒階級」(leisure class)，他們共享一種「炫耀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和浪費的階級文化 (Veblen, 1934)。以上這些概念都和Collins觀點類同，有助於吾人由文化之政治經濟學觀點理解教育。

參、韋伯主義者抑或馬克思主義者？

曾有學者以「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概念來含括Collins的論述，譬如紐約州立大學的S.C. Dubin在〈象徵的奴隸制〉(1987, 34, 2: 137) 作品中提到，通過象徵的或符號的手段來維繫社會關係是值得留意的，「文化資本」正是被支配階級看重的象徵的或符號的手段，且與教育進行再製過程有關，此處他同時引徵了Bourdieu和Collins的作品。台灣學者中，黃毅志亦有某種類似的處理，他曾以所謂「文化資本(源)」合在一起的處理方式指涉Collins的理論(黃毅志, 1999: 9-11)。這一點值得探討一下，有助於本文深入了解Collins。事實上，不只是他這麼理解Collins的理論，與Bourdieu合寫《反思的社會學之邀》的L.J.D. Wacquant就在該書中表示，美國社會科學家傾向從Bourdieu學說中截取出一部分——如文化資本——來做研究，在註解中他點名Collins即為其一，他認為這容易誤解Bourdieu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4, 4n)。Collins是否受Bourdieu影響呢？Collins在著作中曾表示，由於太過注意學校能否在家庭因素外造成社會流動，致忽略有所謂「教育的階級」(educated class) 以代理的族群(surrogate ethnic group) 或「假族群」(pseudoethnicity) 之姿態出現，後者將不會使用其詞彙或不解其經典者，阻止於求職路上。在這裡，他引徵了自己和Bourdieu的作品 (Collins, 1975: 87)。但他卻在另一作品中明白表示，閱讀Bourdieu的著作，會發現自己錯置在法國知識的精神風潮裡，每一頁皆是邏輯上的似是而非與形上的演技，但在考察了他的教育和文化論述後，他指出Bourdieu 思想的根源之一是韋伯 (Collins, 1981: 173, 174)。雖然Collins 似乎不喜歡Bourdieu的風格，亦曾表示Bourdieu主張教育係藉由將父母的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而再製階層化，而他的理論異於Bourdieu，然並未明確表示自己的理論反對他。但既有人認為他二人探討教育與不平等問題的角度接近，而Bourdieu思想的根源之一是韋伯，那是否意味Collins的理論亦與韋伯脫不了干係呢？

C.F. Armstrong在評論Collins時指出（1981, 59: 3），針對文憑社會藉由掌握文化意識與身分封閉圈（closure）而主宰了政府與大企業，Collins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式批判。但是卻有不少其他學者指出Collins對文憑制度的批判是一種韋伯式的（Weberian），或其接近於韋伯的理論（DiMaggio, 1982, 47: 189-201; Hickox, 1982, 33, 4: 563-578; Murphy, 1982, 11: 165-178；黃毅志，1999），或直接、間接稱其理論為新韋伯主義理論（Murphy, 1986, 37, 1: 39; Smelser, 1984: 251）。

究竟Collins是韋伯式理論家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呢？本文主張，雖然其本人自認為傾向前者，經本文探討後也的確發現論述邏輯有親近於韋伯之處，但其文本中亦存有某些馬克思主義詞彙——如上／下層建築，這如果從某種結構主義——如阿圖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看來，是可以作為文本解讀的「癥候」（symptom）（Althusser, 1971）。由此「癥候」吾人可發掘出為一般教育論述之學者所忽略的問題，即：Collins對韋伯與馬克思主義間之關係有著特定的詮釋。吾人以為對這詮釋的掌握將有助於回答Collins究竟是韋伯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以下本文即依此一方向作進一步的比較與探究。

前文中曾言及Collins引述韋伯對新教徒與天主教徒間的在政治文化上的對照，事實上，他還在其他幾個地方引述韋伯的觀點。在前面談到支配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區分中，理解人們所屬較小群體的文化／政治——尤其交談的形式及其排斥性——是一重要關鍵，Collins便會在此以韋伯的「身分群體」（status groups）來說明這種小群體的性質（Collins, 1979: 58）。Collins對韋伯此一概念的理解是：在排外方面具自我意識的群體，係於共同的經驗、利趣（interests）與資源的基礎上形成（Collins, 1979: 134）。

然而，根據Collins在論述文憑社會中提到韋伯的這幾處，恐怕不足以論斷他是否即為一韋伯主義者。要回答這一問題，得回到韋伯的相關作品中，加以進一步探查。

韋伯在其本人作品中指出，相較於階級，「身分」（或身分群體）（Stände）通常是群體，雖然它們無有定型，相對於「階級情境」之純粹被經濟決定，存在著人們的生活被一種特殊的、關於榮耀（honor）之正面或負面評估所決定的「身分情境」，在內容上，「生活風格」（style of life）是一個人欲進入某個圈子時最被要求的東西，這顯示了身分榮耀之存在，與此一要求相伴隨乃對社會交流的限制，此處的社會交流指涉對經濟或其他目標無所裨益的那些社會交流，於是像婚姻對象就會被局限在某一身分群體中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Weber, 1968: 932)。此外，身分群體還壟斷某些物質，譬如配帶武器的特權、食用對他人而言是禁忌的食品 (Weber, 1968: 935)。前曾言及Collins認為韋伯的身分群體指涉在排外方面具自我意識的群體，韋伯的確在此談到排外的狀況，他認為對某些物質的獨占提供了身分群體排外的主要動機，雖然物質對他們而言是非常充分的。韋伯還提到，市場是不認得榮耀的，身分群體的榮耀絕對憎恨市場的本質——努力的討價還價。進而言之，「暴發戶」是從不被有特權的身分群體所認可的，不管前者是否已全然將生活風格調整到與後者一致，蓋後者只接納在其身分群體的傳統氛圍中「被教育」的後繼者 (Weber, 1968: 935, 936-937)。在此，韋伯企圖指出榮耀／市場（或身分群體／階級）在分析上是排斥性概念，但在經驗上，一個人是可以同時表現出這二者，蓋一名資本家可以擺出一付他對錢財毫不在意的模樣。

由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Collins有關職位差異連繫到文化資源或文化市場的見解，與韋伯對身分群體的論述的確相親近。在工作場合中，由於受所屬群體的影響，人們傾向於在社會交流中，接納某些人而排除其他人，尤其在各種交談形式與內容中，使得某些人即便想硬湊身過去，也終將落個自討沒趣。

但是，文字上看起來，韋伯的身分群體概念似乎只能指涉Collins的占有高職位的人，蓋身分群體特別跟一種榮耀有關，甚至須以蹶躩經濟財富為表現方式，這似乎不是職位低者能做到的。當然，並不因此謂Collins在此的高／低職位對立概念僅有一半適用韋伯理論，因為可以說Collins的低職位者即不具身分群體資格的人；然而，這樣的詮釋即將所謂「不具身分群體資格的人」，當成了身分群體的殘餘項 (residual)——亦即將所謂身分群體以外的各型各類人皆率爾劃歸為同一個項目之下。這雖說得通，卻係一消極的處理方式。本文以為，依循韋伯的論述邏輯可推論出，也存在著屬於占有低職位者的身分群體。因為低職位者一樣可以有表現其榮耀的方式，這榮耀的表現方式甚至也可以顯現為對財富的不在意，譬如偶而和其他低職位者共餐時請一次客，或者當新手對勞動過程不了解時，願放下工作幫他解決，或說服同事們一同抵制高職位者的某些安撫等。這也就是Collins所言，即使是勞動階級亦涉及政治的勞動，他們會對人與人的關係作某種安置，低職位者若不順從，仍可能遭排擠而孤立，致喪失某些藍領者可得之利益。

另一方面，Collins的文化通貨膨脹的觀點，也與韋伯有近似之處。Collins提及，韋伯亦注意到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在教育擴張下，已有某種Collins所謂文化通貨膨脹的趨向 (Collins, 1979: 66)。韋伯談到這方面的問

題，乃是在他探討科層組織（bureaucracy）與教育間關係之際（Weber, 1968: 998-1003）。

不過，Collins卻也提出了他與韋伯的差異處，這可能是學界論者均未能留意到的。吾人指出，須注意Collins雖認為韋伯的身分群體與他談的文化資源或文化市場頗接近，但他以為「意識共同體」或「意識社群」（consciousness communities）這概念更具優點，「意識共同體」或「意識社群」的成員共享一套對現實予以定義的象徵或符號；其優點是可提醒大家，他所探討的共享文化資源的群體有著各類形式，有些存在期較長，有些較短，有些在人際的承諾上很強烈，有些則較淡薄，有些規模大，雖然其中人們不見得都認得彼此，卻有著成為潛在朋友的連結性，另一些則規模小。韋伯所言的身分群體可能比較屬於規模較小，較持久，人與人之間對榮耀的要求很強烈的狀況。亦即韋伯的身分群體比Collins的「意識共同體」或「意識社群」在範圍界定上來得狹小。

儘管如此，本文仍認為此處不過是Collins對韋伯的身分群體概念作一部分之修改，仍保留了許多韋伯的論旨含義。那麼，接下來，本文要追問的是，Collins的論旨與馬克思主義是否有所牽涉呢？

本文以為，既然已確認了Collins係以一修正後的韋伯主義者解讀文憑社會，那麼，回答Collins與馬克思主義是否有所牽涉，若可將問題轉置為：Collins如何看待韋伯與馬克思的關係，尤其，Collins如何看待韋伯的身分群體與馬克思的階級觀及二者之關係，將有助於再界定文憑社會的主張是什麼樣的論述文本。

Collins在其《四個社會學傳統》（註3）一書中，清楚地表示，馬克思與韋伯這兩路傳統常被視為相反路線，但其實二者共有許多相似處，都發展了資本主義理論、階層化理論等，其中就階層化理論言之，韋伯也仍舊是在馬克思的基礎上作修改。身分群體並不應如某些學者般理解為對立於階級，身分群體雖容易被聯想為族群、宗教群體等，但須注意的是，階級是對某些市場享有特定獨占的群體，他們是藉由法律或文化上的界限以形塑意識而能做到的；簡言之，藉由發展成身分群體，階級於是更形確立。中古時代的地主不只是占有土地，他們還發展出騎士的禮儀，避免讓雙手觸及血以外的不潔物。以上若由馬克思看來，他們是自我捆綁於意識型態中，韋伯不反對這觀點，但他說即使是意識型態（或用他的話來說是文化資源）卻對他們而言是絕對重要的，因為對維繫經濟財富來講，身分群體是一必備武器（Collins, 1994: v, 88-89）。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在其他專論韋伯的作品中，Collins提到身分群體牽涉一重要的正當化過程（Collins, 1986a: 134），身分群體係階級享有獨占及維繫其自身之所必須（Collins, 1986b: 14, 128-129）。Collins認為韋伯為馬克思的資源衝突觀增加一些複雜性，展現出「心靈生產」或象徵之生產在分析上是異於一般財產的，可以說韋伯說明了有不同形式的財產衝突共存（Collins, 1975: 58）。

韋伯曾表示存在一種「情緒性的生產之工具」（means of emotional production）——正是它成為宗教權力的基底，乃鬥爭中的另一種資源——將階級轉置為身分群體，於是使「正當性」成為一焦點問題。Collins緊接著表示，在此韋伯的理論是與涂爾幹（E. Durkheim）等人類同的，甚至在這方面，由於牽涉到某些引發情緒的互動儀式以增進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註4），Collins更覺得接近涂爾幹。另一方面，Collins由於著重日常文化所具有的排除力，而日常文化的形塑也有著各種儀式性交換，這方面Collins留意到Erving Goffman的理論對他的分析很有價值，而Goffman正是受到涂爾幹對儀式研究之影響（註5）。吾人在此可進一步指出，前面所談到作為人與人之間交往圈的邊界條件的「交談市場」，正與Goffman由微觀角度談「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Goffman, 1967）與各種談話式樣（Goffman, 1981）——特別在公共場合中（Goffman, 1971）——有著諸多關於「文化政治」上的類同論述。因此，此處的結論是：Collins乃以韋伯為主軸，吸收馬克思、涂爾幹與Goffman等成為一套架構，以分析教育及社會文化資源的各種不公平分配（Collins, 1975: 58-59）。

然而，以上論述若由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之另一角度觀之，則可謂Collins其實仍把韋伯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補充者或修正者。是以Collins將各家社會理論歸整為四大傳統時，韋伯是和馬克思同被Collins置放在所謂衝突傳統下，且在該傳統中馬克思具樞軸（pivotal）之地位（Collins, 1994）。於是乎，爭辯Collins的文憑社會理論是韋伯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之文本，就成為一可解決的問題。Collins的文憑社會觀既作為一修正下的韋伯主義之文本，他又將韋伯詮釋為一修正後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麼，從這個邏輯可以推論出：Collins的文憑社會觀於是可詮釋為一修正的馬克思主義之文本（註6）。

肆、文憑社會論所具之台灣經驗意涵(代結論)

台灣的經濟學者張清溪、吳惠林認為日常生活中常聽到的文憑主義和升

學主義，是不太正確的觀念，他們主張如果會因一紙文憑就高薪僱用，這只可能發生在政府部門，不會發生在民間企業，民間企業如果真接納文憑，必然因文憑確實與生產力相關，他們也支持教育應以經濟發展為目的（張清溪、吳惠林，1996：39，41-44）。看來他們二位似乎並不同意Collins的觀點；但至少他們同意政府是可能接納高學歷者擔任「閒差」的，這點仍多少接近Collins的觀點。黃俊傑教授等也同意「文憑主義」是學生湧向大學的根本原因，而他們不接受「大學生大量過量之後大學文憑不值錢，則文憑主義終將式微」的說法，而主張我國由於國民好結黨結派，遇事常憑主觀直覺，文憑便成為唯一客觀服人標準，故廣設高中大學，反使文憑主義升級，有志之士會追求更高文憑，這也符合過去的經驗（黃俊傑等，1996：99-101）。黃俊傑等的說法，與Collins相當一致，尤其是與其謂教育成為「文化通貨」而走向通貨膨脹的論述相近，只是他們並未追究文憑之成為所謂「客觀」標準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過程。林文瑛、王震武則留意許多文獻常顯示，擴張教育並不必然帶來經濟成長，他們發現台灣白領階級中的地位較高者，在人數比例上具大學以上學歷遠高於具專科學歷，更高於具高中職學歷者，台灣的公、民營各機構，用人、敘薪莫不依憑學歷（林文瑛、王震武，1996：15，43-44）。章英華等指出，由於文憑主義深入人心，教育在台灣人民而言不只是提高職業、收入，更是增進自己對社會地位的評估之變項，高學歷者即使職業與低學歷者一樣，仍會對自己的地位有較高的評估，這恐怕顯示了中國傳統的嚮往士大夫生活及職位的心態，仍然存在（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112-113，116-117）。由以上簡要的各項台灣經驗研究之回顧，這些學者的作品似乎都透露了：Collins論述相當程度上可運用於解說台灣的教育與相關的社會資源之不均分配，因此仔細地面對Collins的文本，也就成為一項值得教育學術界繼續努力的工作。

註 釋

註 1：「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的「社會正義」觀係以John 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Rawls, 1971）立論（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1996：30-31）。Rawls由於運用了某些經濟學概念探求分配正義，故也受到經濟學家重視；但Rawls的正義觀亦受到Nozick抨擊為與自由之原則矛盾（Nozick, 1974）。「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的「社會正義」觀是否亦有上述問題，此處不擬追究。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註 2：另兩位是馬克思與涂爾幹。

註 3：Collins的《四個社會學傳統》一書出版前，有另一版本——《三個社會學傳統》（Collins, 1985），後來增加的一個傳統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方面的論述。

註 4：有關此處所涉及之涂爾幹理論可參考黃駿（1993, 1992）。

註 5：他在《四個社會學傳統》中將Goffman同時列在涂爾幹式傳統與微觀互動論傳統（Collins, 1994）。

註 6：只不過，依吾人上面詮釋，Collins對韋伯的修正似乎較小，而Collins觀點下的韋伯對馬克思的修正較大一些。

參考書目

- 四一〇教育改造聯盟（1996）。民間教育改造藍圖。台北：時報。
- 周珮儀（1999）。左右為難：新左派與新右派的教育政策社會學分析。第二屆台灣教育社會學論壇會議手冊暨論文集，頁527-549。台北：教育部主辦。
- 林文瑛、王震武（1996）。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議會。
-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兼論：對技職教育改革的政策意涵。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張清溪、吳惠林（1996）。教育應以經濟發展為目的？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黃武雄（1997）。台灣教育的重建：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台北：遠流。
- 黃俊傑、吳展良、陳昭瑛（1996）。分流教育的改革：理論、實務與對策。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巨流。
- 黃駿（1992）。道德教育與道德紀律和制裁——涂爾幹的教育社會學。現代教育，8（2），頁3-8。
- 黃駿（1993）。生物學演化論在社會理論上之意含——涂爾幹與斯本塞的社會變遷觀比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 B. Brewster.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Armstrong, C.F. (1981).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Book Review. *Social Forces*, 59 (3), 861-862.
- Bourdieu, P. and L.J.D.Wacquant (1992).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urris, V. (1983).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Overeducation. *American*

- Sociological Review*, 48, 454-467.
- Collins, R.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002-1019.
-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Y: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Y: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 (1981). *Sociology Since Midcentury*. NY: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 (1985). *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 (1986a). *Max Weber: A Skeleton Key*. London: Sage.
- Collins, R. (1986b).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 (1988). *Theoretical Sociology*. Florid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ollins, R. (1994).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89-201.
- Dubin, S.C. (1987). *Symbolic Slavery. Social Problems*, 34 (2), 122-140.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 essays in face-to-face behavior*. Chicago : Aldine Pub. Co.
- Goffman, E.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Penguin Books.
-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ickox, M.S.H. (1982). The Marxis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qu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4), 563-578.
- Katz, J.E. (1983).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Books in Review*. Society, Jan/Feb, 91-92.
-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 Murphy, R. (1982). Power and Autonomy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1, 165-178.
- Murphy, R. (1986). Weberian Closure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1), 21-41.
- Persell, C.H. and Cookson, P.W. Jr. (1985). Chartering and Bartering: Elite Educ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Social Problems*, 34 (2), 114-129.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melser, N.J. (1984).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Veblen, T. (193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Y: Modern Library.
- Wanner, R.A. and L.S. Lewis (1982). Trends in Education and Earnings, 1950-70: A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BER/?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文化之政治經濟學、組織政治與身分群體——Collins論文憑社會及與韋伯理論之關係

Structur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61 (2), 436-455.

Weber, M.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Roth, G and C. Wittich.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Status Groups — Collins on Credential Society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Weber's Theory

Chun Huang

Abstract

The 410 Movement for educational reform which occurred in Taiwan in 1994, set up a claim for widely establishing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t deserves analyses concerning whether the claim can actually improve social justice or push the equalitarian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is would connect with the topic of credentialism. Through analyzing viewpoints of Collins' credential socie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y using his modified concept of 'status group' from Max Weber, Collins claims the 'dominant class' will make the 'cultural market' a key to the maintenance of its 'positions'. Thus the credential becomes 'cultural currency', a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flation of 'cultural currency', organizations of many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crease 'sinecures' to contain those who have high-order credentials.

After discussions, we discover Collins' Weberian perspective can still be understood in the framework of Marxian thoughts of class, though he uses Weber's theory as an axis to absorb the traditions of Marx, Durkheim and so on. This discourse benefits to some exten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 and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aiwan.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cultural capital